

聚焦

最近，一部悬疑题材的电影正在院线热映，那就是赵德胤导演的《乔妍的心事》。值得关注的是，这部电影改编自张悦然的中篇小说《大乔小乔》。作为著名的“80后”作家，张悦然一直坚持创作，出版了不少女性题材的作品，《大乔小乔》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获得了巨大的曝光度和影响力。毫无疑问，青年文学的影视改编已经成为中国文艺界的一个热门现象，而《乔妍的心事》正是其中的代表。



电影《乔妍的心事》海报。

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

新书

李白与长安的历史交响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侯赛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海滨的全新力作《李白的长安道》近期推出，这部著作以独到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深度挖掘了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精神世界，尤其是他与长安这座城市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李白。

本书既不是对李白生平事迹的排比，亦非一味追求戏剧化的诗人轶事揭秘。相反，海滨致力于为读者勾勒一幅生动立体的画卷，展现李白精神世界的丰富层次与深刻内涵。在这趟精神旅程中，我们将见证诗人既在鲜花与美酒中畅饮欢歌，亦能在困境与挑战中砥砺前行，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李白精神成长的里程碑

为何选取长安这一视角切入呢？海滨表示，在李白心中，长安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都城，而是永恒的政治梦想和精神坐标。长安，承载了李白对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的渴望。“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海滨引用李白诗句，阐述了李白青年时代立志于世的决心，以及他将自身才华献予盛世的愿望。

海滨将李白与长安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李白三次重要的长安之行，以此构建起了李白精神成长的时间轴：开元年间，初次入长安，年轻的李白满怀壮志，试图以门客的形象博取王公大人的赏识；第二次，天宝初年，受诏入京，他怀揣帝王梦，渴望成为辅佐明君的关键人物；最后一次，天宝末年，面对国家动荡的预感，李白挺身而出，欲向朝廷谏言警世。这三次长安之旅，见证了李白从自我追寻到家国担当的精神蜕变，也映射出唐代由盛转衰的时代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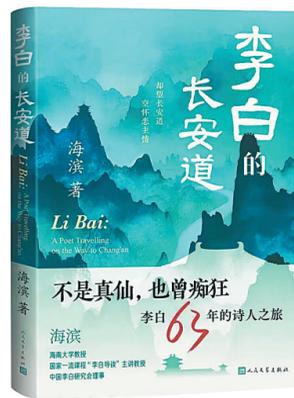
该书紧紧围绕诗人人生各阶段的关键性问题，以研读经典作品为切入点，层层深入，细细探究，内容新颖，富有启发。从早年的豪迈洒脱，到晚年对生死、隐逸的沉思，李白的诗文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他内心世界的变化轨迹。

从多个维度接近并理解李白

本书不仅是海滨个人学术成果的展现，更是对前人研究智慧的致敬与延续，是一次集中而巧妙的对李白研究的学术成果展示。本书通过讲述李白的人生故事，旨在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李白与长安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穿插展示诸多学术界示李白生平、诗歌的深入见解，为普通读者搭建一座通往李白精神世界的桥梁。

海滨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几位学者的贡献，如安旗先生、薛天伟教授等人在李白生卒年争议方面的权威观点，确定李白享年63岁。此外，对于广为人知的《静夜思》不同版本的考证，以及《梦游天姥吟留别》题目正确的断句方式等，均进行了详细阐释，展示了一代代学者对中国文化传承中对待古籍文献的态度与方式，即尊重原文、审慎校勘、深入探究。

当代年轻人该如何深度解读李白呢？海滨提出“三步走”阅读法：首先，要沉浸于原汁原味的李白诗文。其次，是结合生平事迹，理解诗文内涵。再次，就是亲历实地探访，体验文化共鸣。他特别提及了自己最近探访的安徽当涂县大青山，这里是李白的终老之所。海滨说，无论是攀登大青山感受李白在理想挫败后的孤寂感，还是漫步金陵城、长安城街头，都能让人真切体会到李白诗词中所蕴含的浓厚历史文化气息与个人情感色彩，进而产生强烈的共鸣与启发。



《李白的长安道》书影。资料图

从电影《乔妍的心事》上映看青年文学影视改编现象

文学因影视“经典化”

汪荣

青年文学的影视改编蔚为风潮

在影视生产中，编剧的剧本创作处于电影制作的前期阶段，奠定了整个电影的创意基础。在剧本的创作中，一直有着原创与改编的划分。这些年来，文学的影视改编风生水起，而青年文学更是备受市场青睐，其中就包括网络文学和纯文学两个方面。

网络文学可谓是影视改编的重要对象，也是票房和收视率的保证。网络文学成为重要的IP资源，年轻的网文作者亦获得大额的版权收入。很多文学网站榜单上的小说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尤其是电视剧，其中包括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系列，猫腻的《庆余年》系列、辛夷坞的暖伤青春小说、顾漫的纯爱言情小说等等。

而更加偏向纯文学方向的青年文学作品，其被改编的力度也不遑多让。例如，笛安的“龙城三部曲”被改编成电视剧《龙城》，李娟的《我的阿勒泰》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而“新东北作家群”中作家的作品更是被频繁改编为影视剧：双雪涛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班宇的《逍遥游》被改编为电影《逍遥游》；他本人还担任了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文学顾问；郑执的小说《生吞》被改编成电视剧《胆小鬼》。

青年文学之所以成为影视改编的香饽饽，或许与影视受众的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多个影视产业的市场调查显示，青少年是影视产品消费的主力军。青少年有着特殊

的心理特征和情感经验，这倒逼着影视作品的创作朝着更年轻化的方向倾斜。相对于前辈作家，青年作家的创作更加贴近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而这正是青年文学被影视制作公司所看重的首要原因。

文学影视改编中的代际经验

代际经验，是一代人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彼此相通的认知与行为模式，也代表着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它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思想和行为的差异与冲突。刘勰《文心雕龙》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文学乃是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表达，因此最能代表代际经验的流动与嬗变。

青年作家处在一个观察和思考最为敏锐的年龄阶段，因此最能感知到时代与生活的变迁。青年文学的最大意义在于记录和书写新的时代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爱尔兰女作家萨莉·鲁尼因为书写新一代的青年生活闻名于世，她的《正常人》被认为描绘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的独特经验。而当这部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后，更取得了全球性的巨大影响。

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媒介文化生态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疑有着与文学前辈不同的生活世界和情感结构，而这种代际经验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例如，网络作家柳翠虎的小说《半熟男女》和《装腔启示录》，就描写了一群在北京CBD（中央商务区）上班的精英阶层青年男女的“情场如战

场”的故事，探讨了世俗物欲与亲密关系的复杂性。而当她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时，这种充满了当代性的经验被更加直观地展露在观众的眼前。

而这种代际经验的差异性更为明显地展示在“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作为“80后”的作家，双雪涛等人用写作回溯了90年代，用“子一代”的视角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创伤经验和历史记忆。他们的小说成为热门IP，相关的影视改编作品层出不穷，极具商业价值。当他们的文学作品与影视创作联动，也引爆了“东北文艺复兴”，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文学与影视创作之间同中有异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有名言“媒介即讯息”。这句话的意思是：媒介自身就具有价值，它不仅是讯息传播的通道，还极大地影响了受众的思维方式。文学与影视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它们本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文艺门类，有着不同的媒介形态和表意方式。

因此，即便一个文学作品和一个影视作品在内容上是相同的，其人物、情节和时空都一样，但是他们之间依然会因为媒介属性的不同而体现不同的故事形态和叙事风格。的确，虽然是同样的材料，也会因为烹调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完全不同的风味。翻译即背叛，文学被“翻译”成影视作品必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背叛。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要求影视改编要完全

复制原著。原著只是影视作品改编的基础，至于“怎么改”和“改哪些”，则要遵循影视创作的一般规律，发挥影视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

青年文学的影视改编，必然是需要进行加工、调整和转化的。改编的过程，有时候是重新编织的过程，例如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原本是散文作品，故事性不够，那么主创就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增补，增加了人物和戏剧冲突。同时，改编也可能是删繁就简和变换风格，例如张悦然的《大乔小乔》在改编为电影《乔妍的心事》时就减弱了原著的残酷性和尖锐感。

影视作品是用运动的影像进行叙事，肯定有视觉方面的追求，这就让文学作品锦上添花，让故事以更加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刺杀小说家》是青年导演路阳由双雪涛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小说原著中已经涉及了现实社会与游戏世界的交错与互动，而当小说里的游戏世界被电影呈现在银幕上，则更彰显和放大了原著里的脑洞和奇诡的想象力，代表了中国影视创作的新方向。

总而言之，在文学与影视之间，存在着双向奔赴和双向赋能。一方面，文学为影视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叙事基础，提高了影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另一方面，影视也反哺文学，让文学得以破圈传播，增加了文学的受众和影响力。一个好的青年文学作品，是一个“无尽藏”，并不会因为影视改编而丧失其魅力，反而会因影视作品的传播扩散开启“经典化”的过程，最终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走近。在这个意义上，影视改编为青年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未来可能性。

人物

潜心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印度汉学家——狄伯杰的中国“结”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人生漫漫，岁月悠悠。印度汉学家狄伯杰(Bali Ram Deepak)自1984年与中国文化“结缘”后，便将半生心血倾注于中国。他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印地语，带到印度，让印度人读懂中国。

10月28日，狄伯杰做客海南大学人文社科名家讲坛，以“与中国交往四十年：文明的相互联系必须为未来的合作铺平道路”为题作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他，听他回顾自己与中国“交往”40年来的心路历程。

从“向往中国”到“中国女婿”

狄伯杰与中国的情缘始于儿时。在印度史诗和歌谣中，他常常听到“中国”两个字，这像一种神奇的魔力，牵引着他对中国充满了向往。读高中时，为更好地了解中国，他几乎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报纸、杂志和期刊，但遗憾的是，相关资料寥寥无几。因此，考大学时，对中国仍“念念不忘”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尼赫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1984年，在大学图书馆，一本名为《东亚史》的书为他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大门。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后来的各个朝代，这本书让他对中国的认识从模糊变得清晰，他深刻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悠久与文化的灿烂。

结束在印度5年的汉语学习后，狄伯杰于1991年来到北京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专门学习、研究文言文、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的汉语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也让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96年，他再度来到北京，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中国文化与文明的高级研究。

在北大期间，狄伯杰认识了北京姑娘王瑶，两人后来步入婚姻殿堂，狄伯杰也正式成为中国女婿。这段跨国婚姻不仅让他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让他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了更多的动力和支持。

从“研究者”到“翻译者”

在妻子的帮助下，狄伯杰的汉语水平突飞猛进，他的研究成果也随之不断涌现。自2001年起，他就中印关系和中国文学发表了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并撰写了多部专著，如《印中对话》《20世纪上半叶的印中关系》及《中国诗歌：从诗经到西厢记》等。

然而，狄伯杰深知，要让更多印度人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印地语。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四书”。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四书”通篇文言文，翻译起来难度极大。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翻阅了大量中国人解读“四书”的书籍，并向中国专



狄伯杰。海南大学供图

家请教。经过近十四年的努力，他终于顺利完成了翻译工作。

2016年，由他翻译的印地语版《论语》率先出版，随后，《大学》《中庸》和《孟子》也相继出版。此外，他还将在《儒林外史》《红楼梦》《窦娥冤》和《西厢记》等经典作品翻译成印地语。

从“拓荒者”到“引领者”

在印度，狄伯杰是研究、传播中国文化的“拓荒者”。三四十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时，很少有人关注中国文化。但他坚信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并致力于将其介绍给更多印度人。

2015年底，由尼赫鲁大学教研人员为主体的翻译团队正式建立，共有约17位精通中文及印地语的专家、教授加入。他们精选25部中国经典翻译成印地语，并已经有多部作品与印度读者见面。这些作品包括吴承恩的《西游记》、老舍的《骆驼祥子》、余华的《活着》、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巴金的《家》以及阿来的《尘埃落定》等。

让狄伯杰高兴的是，中国经典作品在印度市场受到了普遍欢迎和广泛好评。目前，在印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潮已经悄然形成。尼赫鲁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总数已经从几十年前的3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200多人，其中包括20多个博士生。

